



邓永耀：身先士卒抗日寇 危难时刻显担当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邓永耀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努力学习共产主义，创造社会主义，世界责任在我肩……”在湖南省茶陵县列宁学校，保存着抗日英雄邓永耀为这所学校的前身——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所作的校歌。这首歌是他为青少年所作，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1912年1月24日，邓永耀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期在私塾读书，成绩优异。1930年，邓永耀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湘东特委委员。后来在区、县苏维埃政府做文书工作，草拟文稿。他工作认真负责，文思敏捷，口笔均善，待人诚恳和蔼，工作不知疲倦，深得同志们的好评。

1934年8月，邓永耀随红六军团西征。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其先后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红六军团宣传部长，后调红四方面军。1938年，邓永耀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率领400名新兵击毁了日寇40多辆军车，自此，邓永耀的英名在冀南地区传开。

1938年5月，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东进二团政委的邓永耀，率领二团进到冀南永年县境内，部队夜宿野外，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同时，他率领部队肃清土匪，城内百姓夹道欢迎东进纵队第二团入城。邓永耀在城内南大庙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抗日政策，指明革命方向和前途，号召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日，并着手组建中共永年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县民族战争战地委员会，相继成立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同时鼓励发展工商业，恢复集市贸易，号召农民种高粱，发展农业生产，加快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1939年初，日军集中5个师团分多路“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邓永耀来到了东纵一支队，率部参加冀南五分区的反“扫荡”。3月3日晨，盘踞在武邑县城的日军向西屯一带“扫荡”而来，准备偷袭。当时，邓永耀正在西屯集中部队开会，听到敌军的枪声时，情况已十分紧急。他果断命令一部分指战员组织和掩护群众转移，另一部分约30名指战员由他亲自率领奔往西屯村西部，抢占有利地形，担负阻击并将日军引入伏击圈的任务。在激烈的交战中，他头部和腿部均中弹，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1940年，武邑县军民各界在邓永耀墓前立碑撰文纪念。邓永耀壮烈殉国，也在全国引起震动。1939年4月1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了《纪念邓永耀同志》一文，讴歌了烈士的光辉战绩和革命斗争的一生。1940年，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编印了一本油印的《烈士传》，师长刘伯承在序文中称赞邓永耀是“伟大的革命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直到今天，邓永耀的事迹在衡水市博物馆的抗战英烈事迹电子屏展播中均有收录播出，参观者可以在博物馆内了解英雄、告慰英雄。在邓永耀曾工作过的茶陵县列宁学校(原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邓永耀的故事也在被学生们传颂着。“邓永耀同志为学校写下的校歌，字字都饱含着对理想的坚守和对青年的期许。我们会把他的故事融入思政教育，让孩子们知道要去践行的责任和担当。同时，组织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担当责任，这是对邓永耀精神最好的延续。”茶陵县列宁学校校长谭弹力说。

(据新华社长沙8月6日电)

北京启动“伟大抗战精神”百姓宣讲活动

本报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王昊男)8月11日，北京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教育宣讲活动推进会暨“伟大抗战精神”百姓宣讲团首场报告会。活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社科院(市委讲师团)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丰台区委宣传部承办，来自首都各界的干部群众代表200余人参加。

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长沙峰追忆姥爷左权将军、丰台区宛平街道社区工作者郑然接过了爷爷郑福来73年风雨无阻的义务讲解“接力棒”，中央音乐学院教师从榕带领听众回溯《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历程……报告会紧扣“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一主题，一个个来自百姓的鲜活故事，将厚重的历史化为直抵人心的力量。“曾经，先烈们以血肉之躯托起了民族‘站起来’的脊梁；今天，我们唯有铭记、传承与奋斗，方能续写‘强起来’的时代华章！”一名观众说。

报告会还设置了“向英烈向前辈致敬”特殊环节，运用AI技术，生动还原了左权、吉鸿昌等英雄的光辉形象。首场报告会结束后，北京市“伟大抗战精神”百姓宣讲团将到全市重点抗战类纪念馆、以及机关、校园、企业、社区等基层单位开展宣讲。

本版责编：张彦春 康岩 刘涓涓 版式设计：张芳曼

从螺壳堆中探寻古滇国历史

本报记者 李茂颖

因赓续历史文脉·考古故事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组建于2014年，主要工作是系统开展对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揭示遗址布局与功能分区、建立遗址编年体系、解读出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推动古滇文化与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等相关工作。目前，工作队基本确定汉代益州郡城址的大致布局，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一批与古滇国、益州郡有关的官印封泥，发现大量有字筒牍及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2025年4月，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编者



图①：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铭文瓦当。

图②：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俯瞰图。

图③：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土方。

图④：蒋志龙在整理出土瓦片。

以上图片均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一种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探方周边挖掘排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样貌：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

“道路经过多次铺装，两侧挖有排水路沟。土层中掺杂的陶片、碎螺壳和瓦砾让路面更坚硬密实。”负责清理的队员贾鹏指着剖面清晰的5层土层介绍。

通过对路面采集土样的测年分析，队员们初步确定道路年代为西汉至魏晋。“目前探明总长约300米，从出土的箭镞、剑、盖弓帽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贾鹏说。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层和遗迹后，建筑区的轮廓逐渐清晰。北侧的汉代高台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台基高约1米，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用黄土与螺壳分层铺筑——上下层为黄土，中间夹螺壳堆积，推测螺壳用于加固、渗水与防潮。散水、柱础石、柱洞等遗迹在小铲下现出真身。“这样的大型高台建筑明显带有官方属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蒋志龙说。

在河泊所遗址西区，队员们清理出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表明这一地区可能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河泊所遗址东区，遗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等大量筒牍，出土70余吨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为遗址性质提供了关键佐证。

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官方属性的高台建筑、标记信息的瓦当、功能完备的城市分区，这些发现最终揭开了遗址尘封千年的双重身份。蒋志龙说：“这里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遗址核心区东部，正是汉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分为6个党员先锋队，清理杂物、粉刷墙面、装饰巷道、平整道路……上班没空，就下班干；平时没空，就周末干。

2023年5月，小巷前200米的垃圾清运了，墙面粉刷了，环境变美了，随后就火了。“老城还有这么美的一条巷子呢？”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闻讯而来。离开时许多人遗憾，“200米太短，不够逛。”

活，也给我们送茶水、送瓜果、送吃的。”张斌说，“有些居民搬到新城，没法回来参加改造，就把家里漂亮的碗碟、挂毯、茶壶等老物件捐出来做物料。”

在100多名基层干部带动下，辖区4000多名居民陆续参与了改造。

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是施工员。以前装满垃圾的窄巷，被参与清理队的居民艾

则孜·艾买提命名为“天空巷”；居民捐出的碗碟茶壶，成为小巷墙面独特的装饰；小巷两侧的花草，是居民送来的……1.2公里长的小巷，一步一景，1000多件老物件都来自居民捐赠，设计理念都来自本地居民。

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库车市安排了专项资金，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组织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街区内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修缮与

展陈提升，引进浙江古建筑修复团队“传帮带”，培养了80多名本地工匠。

老城的历史韵味和非遗技艺均被保存了下来。167座老屋焕发新生，精心修缮的老屋变身为中轴创业工坊，有的开设了奶茶店及非遗工坊；老屋“古丽的家”成了新疆乐器展和电磁五弦琵琶传习馆。

游客纷至沓来，龟兹小巷成为很多人的打卡地。先来西克买尔·克然木和家人在小巷开起了特产店。00后姑娘星星在这里定居，还开了旅拍店，生意红火，“街坊邻居特别热情，古尔邦节还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

目前，龟兹小巷已入驻手工艺品、民宿、餐饮、旅拍、文创等各类商家33家，招商引资7000余万元，带动200多人就业。周边业态收益也随之增长32%。

走进小巷，一面墙壁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墙上密密麻麻，是小巷建设者的名字。有党员、有群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两年来，大家干在一起，吃在一起，说说笑笑间，打开了院门，也打开了心门。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寻，古滇聚落初现

一场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漫了个透。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水位缓缓下降，经过2000多年时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这样随着水位退去，一点点显露出真容。

“我已经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执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遗址，话题离不开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迎来重大发现——“滇王之印”出土。“总算有实物证明了司马迁写的古滇国是真的。”蒋志龙说。

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铜残片时，他总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哪儿？”

要证明一个“古国”真实存在，发现墓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他们生活的痕迹，比如城池、道路遗迹、村落痕迹，才能观察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古代社会。”蒋志龙说。

大观楼长联里“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描述，让蒋志龙和团队一度推测，古滇聚落或许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顶或山腰部位。可他们搜寻多年，却连半点聚落的痕迹都没找到。

从2014年开始，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对滇池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展开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采样分析，终于拨开了迷雾：石寨山遗址周边的坝区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显示出具备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循着这一关键线索，蒋志龙把目光锁定在距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时代更早的聚落遗址。“研究发现，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滇池水面还要低3到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主干道与城市分区共现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工作初期，队员们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堆积形态——一种是台地，另

一种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探方周边挖掘排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样貌：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

“道路经过多次铺装，两侧挖有排水路沟。土层中掺杂的陶片、碎螺壳和瓦砾让路面更坚硬密实。”负责清理的队员贾鹏指着剖面清晰的5层土层介绍。

通过对路面采集土样的测年分析，队员们初步确定道路年代为西汉至魏晋。“目前探明总长约300米，从出土的箭镞、剑、盖弓帽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贾鹏说。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层和遗迹后，建筑区的轮廓逐渐清晰。北侧的汉代高台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台基高约1米，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用黄土与螺壳分层铺筑——上下层为黄土，中间夹螺壳堆积，推测螺壳用于加固、渗水与防潮。散水、柱础石、柱洞等遗迹在小铲下现出真身。“这样的大型高台建筑明显带有官方属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蒋志龙说。

在河泊所遗址西区，队员们清理出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表明这一地区可能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河泊所遗址东区，遗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等大量筒牍，出土70余吨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为遗址性质提供了关键佐证。

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官方属性的高台建筑、标记信息的瓦当、功能完备的城市分区，这些发现最终揭开了遗址尘封千年的双重身份。蒋志龙说：“这里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遗址核心区东部，正是汉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分为6个党员先锋队，清理杂物、粉刷墙面、装饰巷道、平整道路……上班没空，就下班干；平时没空，就周末干。

2023年5月，小巷前200米的垃圾清运了，墙面粉刷了，环境变美了，随后就火了。“老城还有这么美的一条巷子呢？”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闻讯而来。离开时许多人遗憾，“200米太短，不够逛。”

活，也给我们送茶水、送瓜果、送吃的。”张斌说，“有些居民搬到新城，没法回来参加改造，就把家里漂亮的碗碟、挂毯、茶壶等老物件捐出来做物料。”

在100多名基层干部带动下，辖区4000多名居民陆续参与了改造。

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是施工员。以前装满垃圾的窄巷，被参与清理队的居民艾

则孜·艾买提命名为“天空巷”；居民捐出的碗碟茶壶，成为小巷墙面独特的装饰；小巷两侧的花草，是居民送来的……1.2公里长的小巷，一步一景，1000多件老物件都来自居民捐赠，设计理念都来自本地居民。

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库车市安排了专项资金，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组织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街区内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修缮与

展陈提升，引进浙江古建筑修复团队“传帮带”，培养了80多名本地工匠。

老城的历史韵味和非遗技艺均被保存了下来。167座老屋焕发新生，精心修缮的老屋变身为中轴创业工坊，有的开设了奶茶店及非遗工坊；老屋“古丽的家”成了新疆乐器展和电磁五弦琵琶传习馆。

游客纷至沓来，龟兹小巷成为很多人的打卡地。先来西克买尔·克然木和家人在小巷开起了特产店。00后姑娘星星在这里定居，还开了旅拍店，生意红火，“街坊邻居特别热情，古尔邦节还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

目前，龟兹小巷已入驻手工艺品、民宿、餐饮、旅拍、文创等各类商家33家，招商引资7000余万元，带动200多人就业。周边业态收益也随之增长32%。

走进小巷，一面墙壁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墙上密密麻麻，是小巷建设者的名字。有党员、有群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两年来，大家干在一起，吃在一起，说说笑笑间，打开了院门，也打开了心门。

龟兹小巷，变了新模样

本报记者 蒋云龙

“改造小巷这件事，群众一开始并不看好。”萨克萨克街道文旅办主任张斌说，党员干部们靠一天一天苦干实干，改变了小巷的面貌，也改变了居民的想法。

“娃娃们不是走过场，他们是干实事。”60多岁的居民阿布都卡德·买买提主动提出，“以后的改造，我也参加。”

“打开家门，主动来干活的多了。不能干

活，也给我们送茶水、送瓜果、送吃的。”张斌说，“有些居民搬到新城，没法回来参加改造，就把家里漂亮的碗碟、挂毯、茶壶等老物件捐出来做物料。”

在100多名基层干部带动下，辖区4000多名居民陆续参与了改造。

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是施工员。以前装满垃圾的窄巷，被参与清理队的居民艾

则孜·艾买提命名为“天空巷”；居民捐出的碗碟茶壶，成为小巷墙面独特的装饰；小巷两侧的花草，是居民送来的……1.2公里长的小巷，一步一景，1000多件老物件都来自居民捐赠，设计理念都来自本地居民。

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库车市安排了专项资金，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组织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街区内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修缮与

展陈提升，引进浙江古建筑修复团队“传帮带”，培养了80多名本地工匠。

老城的历史韵味和非遗技艺均被保存了下来。167座老屋焕发新生，精心修缮的老屋变身为中轴创业工坊，有的开设了奶茶店及非遗工坊；老屋“古丽的家”成了新疆乐器展和电磁五弦琵琶传习馆。

游客纷至沓来，龟兹小巷成为很多人的打卡地。先来西克买尔·克然木和家人在小巷开起了特产店。00后姑娘星星在这里定居，还开了旅拍店，生意红火，“街坊邻居特别热情，古尔邦节还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

目前，龟兹小巷已入驻手工艺品、民宿、餐饮、旅拍、文创等各类商家33家，招商引资7000余万元，带动200多人就业。周边业态收益也随之增长32%。

走进小巷，一面墙壁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墙上密密麻麻，是小巷建设者的名字。有党员、有群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两年来，大家干在一起，吃在一起，说说笑笑间，打开了院门，也打开了心门。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寻，古滇聚落初现

一场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漫了个透。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水位缓缓下降，经过2000多年时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这样随着水位退去，一点点显露出真容。

“我已经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执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遗址，话题离不开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迎来重大发现——“滇王之印”出土。“总算有实物证明了司马迁写的古滇国是真的。”蒋志龙说。

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铜残片时，他总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哪儿？”

要证明一个“古国”真实存在，发现墓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他们生活的痕迹，比如城池、道路遗迹、村落痕迹，才能观察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古代社会。”蒋志龙说。

大观楼长联里“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描述，让蒋志龙和团队一度推测，古滇聚落或许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顶或山腰部位。可他们搜寻多年，却连半点聚落的痕迹都没找到。

从2014年开始，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对滇池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展开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采样分析，终于拨开了迷雾：石寨山遗址周边的坝区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显示出具备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循着这一关键线索，蒋志龙把目光锁定在距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时代更早的聚落遗址。“研究发现，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滇池水面还要低3到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主干道与城市分区共现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工作初期，队员们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堆积形态——一种是台地，另

一种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探方周边挖掘排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样貌：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

“道路经过多次铺装，两侧挖有排水路沟。土层中掺杂的陶片、碎螺壳和瓦砾让路面更坚硬密实。”负责清理的队员贾鹏指着剖面清晰的5层土层介绍。

通过对路面采集土样的测年分析，队员们初步确定道路年代为西汉至魏晋。“目前探明总长约300米，从出土的箭镞、剑、盖弓帽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贾鹏说。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层和遗迹后，建筑区的轮廓逐渐清晰。北侧的汉代高台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台基高约1米，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用黄土与螺壳分层铺筑——上下层为黄土，中间夹螺壳堆积，推测螺壳用于加固、渗水与防潮。散水、柱础石、柱洞等遗迹在小铲下现出真身。“这样的大型高台建筑明显带有官方属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蒋志龙说。

在河泊所遗址西区，队员们清理出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表明这一地区可能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河泊所遗址东区，遗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等大量筒牍，出土70余吨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为遗址性质提供了关键佐证。

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官方属性的高台建筑、标记信息的瓦当、功能完备的城市分区，这些发现最终揭开了遗址尘封千年的双重身份。蒋志龙说：“这里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遗址核心区东部，正是汉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分为6个党员先锋队，清理杂物、粉刷墙面、装饰巷道、平整道路……上班没空，就下班干；平时没空，就周末干。

2023年5月，小巷前200米的垃圾清运了，墙面粉刷了，环境变美了，随后就火了。“老城还有这么美的一条巷子呢？”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闻讯而来。离开时许多人遗憾，“200米太短，不够逛。”

活，也给我们送茶水、送瓜果、送吃的。”张斌说，“有些居民搬到新城，没法回来参加改造，就把家里漂亮的碗碟、挂毯、茶壶等老物件捐出来做物料。”

在100多名基层干部带动下，辖区4000多名居民陆续参与了改造。

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是施工员。以前装满垃圾的窄巷，被参与清理队的居民艾

则孜·艾买提命名为“天空巷”；居民捐出的碗碟茶壶，成为小巷墙面独特的装饰；小巷两侧的花草，是居民送来的……1.2公里长的小巷，一步一景，1000多件老物件都来自居民捐赠，设计理念都来自本地居民。

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库车市安排了专项资金，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组织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街区内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修缮与

展陈提升，引进浙江古建筑修复团队“传帮带”，培养了80多名本地工匠。

老城的历史韵味和非遗技艺均被保存了下来。167座老屋焕发新生，精心修缮的老屋变身为中轴创业工坊，有的开设了奶茶店及非遗工坊；老屋“古丽的家”成了新疆乐器展和电磁五弦琵琶传习馆。

游客纷至沓来，龟兹小巷成为很多人的打卡地。先来西克买尔·克然木和家人在小巷开起了特产店。00后姑娘星星在这里定居，还开了旅拍店，生意红火，“街坊邻居特别热情，古尔邦节还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

目前，龟兹小巷已入驻手工艺品、民宿、餐饮、旅拍、文创等各类商家33家，招商引资7000余万元，带动200多人就业。周边业态收益也随之增长32%。

走进小巷，一面墙壁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墙上密密麻麻，是小巷建设者的名字。有党员、有群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两年来，大家干在一起，吃在一起，说说笑笑间，打开了院门，也打开了心门。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寻，古滇聚落初现

一场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漫了个透。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水位缓缓下降，经过2000多年时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这样随着水位退去，一点点显露出真容。

“我已经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执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遗址，话题离不开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迎来重大发现——“滇王之印”出土。“总算有实物证明了司马迁写的古滇国是真的。”蒋志龙说。

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铜残片时，他总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哪儿？”

要证明一个“古国”真实存在，发现墓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他们生活的痕迹，比如城池、道路遗迹、村落痕迹，才能观察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古代社会。”蒋志龙说。

大观楼长联里“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描述，让蒋志龙和团队一度推测，古滇聚落或许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顶或山腰部位。可他们搜寻多年，却连半点聚落的痕迹都没找到。

从2014年开始，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对滇池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展开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采样分析，终于拨开了迷雾：石寨山遗址周边的坝区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显示出具备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循着这一关键线索，蒋志龙把目光锁定在距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时代更早的聚落遗址。“研究发现，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滇池水面还要低3到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主干道与城市分区共现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工作初期，队员们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堆积形态——一种是台地，另

一种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探方周边挖掘排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样貌：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

“道路经过多次铺装，两侧挖有排水路沟。土层中掺杂的陶片、碎螺壳和瓦砾让路面更坚硬密实。”负责清理的队员贾鹏指着剖面清晰的5层土层介绍。

通过对路面采集土样的测年分析，队员们初步确定道路年代为西汉至魏晋。“目前探明总长约300米，从出土的箭镞、剑、盖弓帽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贾鹏说。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层和遗迹后，建筑区的轮廓逐渐清晰。北侧的汉代高台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台基高约1米，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用黄土与螺壳分层铺筑——上下层为黄土，中间夹螺壳堆积，推测螺壳用于加固、渗水与防潮。散水、柱础石、柱洞等遗迹在小铲下现出真身。“这样的大型高台建筑明显带有官方属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蒋志龙说。

在河泊所遗址西区，队员们清理出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表明这一地区可能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河泊所遗址东区，遗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等大量筒牍，出土70余吨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为遗址性质提供了关键佐证。

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官方属性的高台建筑、标记信息的瓦当、功能完备的城市分区，这些发现最终揭开了遗址尘封千年的双重身份。蒋志龙说：“这里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遗址核心区东部，正是汉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分为6个党员先锋队，清理杂物、粉刷墙面、装饰巷道、平整道路……上班没空，就下班干；平时没空，就周末干。

2023年5月，小巷前200米的垃圾清运了，墙面粉刷了，环境变美了，随后就火了。“老城还有这么美的一条巷子呢？”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闻讯而来。离开时许多人遗憾，“200米太短，不够逛。”

活，也给我们送茶水、送瓜果、送吃的。”张斌说，“有些居民搬到新城，没法回来参加改造，就把家里漂亮的碗碟、挂毯、茶壶等老物件捐出来做物料。”